

杨万秀 主编

邓端本 章 深 著

广州外贸史

(上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杨万秀 主编

广州外贸史

上册

邓端本 章深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州外贸史 上册/杨万秀主编;邓端本,章深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7

ISBN 7-5361-1911-9

I. 广… II. ①杨… ②邓… ③章… III. 对外贸易-
经济史-中国-广州 IV. F7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2861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五华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260 千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9.50 元

目 录

广州外贸的历史地位和特点

——《广州外贸史》序	(1)
------------	-----

第一章 广州外贸渊源及早期的发展 (10)

第一节 广州外贸渊源	(10)
第二节 早期南海道的通商	(17)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外贸的发展	(23)
第四节 早期外贸的管理	(34)

第二章 隋唐时期的外贸 (40)

第一节 隋代广州的海外交通和贸易	(40)
第二节 唐代中国第一大港	(43)
第三节 广州市舶使	(71)
第四节 广州外贸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关系	(79)

第三章 宋代的市舶贸易 (90)

第一节 宋代市舶贸易发展的基本条件	(90)
第二节 市舶贸易的发展状况	(99)
第三节 市舶司制度	(129)
第四节 市舶贸易的经营管理和服务	(136)
第五节 宋代广州外贸的社会作用	(160)

第四章 元代外贸的继续发展 (173)

第一节 继续发展的广州外贸	(173)
---------------	-------

第二节	市舶管理	(185)
第三节	外贸对广东地方经济的影响	(201)
第五章	明代外贸的变态	(206)
第一节	明朝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其对海外贸易的影响	(206)
第二节	明朝的朝贡贸易	(211)
第三节	明朝的私人海外贸易	(215)
第四节	华侨在广州外贸中的作用	(227)
第五节	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对广州外贸的影响	(231)
第六节	广东市舶司	(245)
第七节	广州外贸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252)
第六章	鸦片战争前清的中西贸易	(263)
第一节	起步时的挫折	(264)
第二节	新型贸易秩序的出现和成熟	(272)
第三节	贸易的发展与优势地位的转换	(294)
第四节	贸易利益的严重冲突及结局	(315)
后记		(333)

广州外贸的历史地位和特点

——《广州外贸史》序

杨万秀

广州是我国外贸名城，也是世界闻名的港口城市。

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广州的外贸在广州的经济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广州外贸的历史和现状，总结经验，认识规律，预测未来，对于发展广州的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广州对外贸易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已是我国的主要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点。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是从我国沿海港口出发，经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再远航阿拉伯半岛、非洲和欧洲。通过这条航线，我国的丝绸以及陶瓷、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沿线的国家。同时，“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也将本国的产品及从其他国家贩来的商货运来我国。广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我国最重要的港口，在我国的对外贸易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广州的对外贸易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由此确定了它在我国外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我国最早的对外贸易港

汉以前（包括汉），我国沿海已出现了一些港口。但广州以北的瑯琊、碭石、会稽、句章、吴、东瓯、揭阳等港口均为军港，未见有海外贸易的记载。广州以南的徐闻、合浦虽然与广州同期出现的港口，但它们往后没有大的发展，只是地区性的港口，在

我国外贸史上的影响远不如广州。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广州港的对外贸易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作用也最大。秦汉时期的广州已是我国的外贸港口，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广州的海外贸易还处于初创阶段，规模比较小。

秦始皇统一岭南的目的之一，就是着眼于岭南珍奇异物，为“犀角、象齿、翡翠、珠玑”所吸引。在广州集散的这些珍品，主要来自海外。秦汉王朝的官吏和中原地区的商人，也垂涎海外的舶来品。汉朝初年，不仅岭南的货物在广州集散，中原和四川的特产也运来广州交易。这些货物除一部分在广州及附近地区消费外，有一部分运往海外。汉武帝平定南越后，曾派译使从徐闻、合浦出发，乘船远航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出发地虽为徐闻、合浦，但进行海外贸易的基地是广州。由于当时船舶的续航能力有限，我国的货物运至印度半岛南部的港口以后，以此为中转站，再由安息（今伊朗）和罗马商人运往阿拉伯地区，经埃及的亚利山大港，转运欧洲各地。罗马帝国的商人也越过重洋，给广州运来了珠玑、玳瑁、琥珀、玛瑙、象牙和犀角等。广州与欧洲、北非间的间接贸易逐渐发展起来。

广州汉墓的出土文物中，常见熏炉。这说明当时广州的富豪之家普遍燃烧香料。这些香料的大部分也是从东南亚地区输入的。在广州的汉墓中，还有较多的串珠出土，包括玛瑙、鸡血石、石榴石、煤精、水晶、硬玉、琥珀和玻璃等。还有迭嵌眼圈式玻璃珠、蓝色玻璃碗、绿色玻璃带钩和璧。其中带钩和璧是我国传统的礼仪用品，其他则与传统工艺品不同，应是从海外输入。

汉代海外贸易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东南亚国家的汉文化遗物中找到一些线索。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的一些古墓中，除了五铢钱外，还有中国的陶器。其中苏门答腊出土的一件陶鼎，底部有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的纪年铭文；加里曼丹的印圆圈文陶甗，与广州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出土同类器形非常

相似。这些都反映了我国汉代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而这一时期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主要是从广州及附近的港口出海的。

在广州及其附近出土的汉墓遗物中，还有 10 余件木质和陶质的船模。根据船模和史书的有关记载，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汉代的广州已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出土的船模表明，汉代广州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已相当发达。船模中有一种大型船舶，船上建重楼，有十桨一橹。这就是史书上说的“楼船”，它既可在内河航行，也可出海远航。舵的发明是造船技术的重大进步。船上建楼和船后设舵在我国造船史上的出现，要比欧洲早 1000 多年，广州造航业发达，航海技术先进，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国至隋，广州的海外贸易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国外来我国的海船主要是在广州登陆。由于船舶抗风浪能力和续航能力大大增强，从广州扬帆的船，不仅能航行至东南亚的半岛国家，还可以到达东南亚的海岛国家。东晋南北朝时，从广州出发，经耶婆提（今爪哇）、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到印度恒河口多摩利帝国，已有一条经常往来的航线。从广州出发的船，还可直航波斯湾，到达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的港口和阿拉伯半岛西南的亚丁。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与佛教文化的交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外僧人随商船往来的情况经常可见。在贸易发展的同时，文化交流达到了新的水平。

二、唐宋时期全国最大的贸易港

唐代的广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海外贸易和交通的中心，世界著名的商业大港。

唐代中国与南海、波斯湾地区有 6 条定期的航线。它们都集中于广州，或从广州出发，或以广州为终点。广州港樯帆林立，商

船云集，世界各地的商人来往广州，唐朝的使者和商人到南洋各国也多从广州出发。东南亚地区和阿拉伯国家的使者和商人要到长安和洛阳，一般也从广州入境。这一时期世界贸易的大港苏门答腊东岸的末罗瑜、波斯湾的西拉夫港、埃及的亚利山大港的繁荣，都与广州的贸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国的商品通过广州港运往这些地区；这些地区的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运来广州，再销往国内各地。

广州南海神庙的盛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海外贸易的繁荣。在今黄浦的庙头村附近，曾有一座繁荣的扶胥镇，隋朝时在此建立了南海神庙，后来也叫波罗庙。这里的古商港就是广州的外港。从唐朝开始，南海神庙附近的古港在我国海外交通贸易史上有一段峥嵘岁月，成为我国海外贸易最大的港口。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海神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唐玄宗封海神为“广利王”，诏令每年派中央大吏备礼册祭。此后，历代皇帝又陆续给南海神加上一些称颂、溢美的封号。中外商人和游客都祈求南海神的保护，希望“海不扬波，交通畅利”。所以，南海神庙历代都得到维修，雄伟壮观，香火鼎盛。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唐代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管理海外贸易的官职。市舶使职务非常重要，又是一个“肥差”，开始时是由中央王朝特派，或由岭南节度使兼任。广州外贸的收入非常丰厚。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王锷任岭南节度使时，广州外贸的收入等于当地两税的收入。黄巢起义军占领广州，宰相于琮甚至认为这会导致国库空虚。可见当时广州外贸的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公元7世纪初，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成了唐代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伙伴。随着大批阿拉伯人的到来，伊斯兰教也开始传入我国。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紧密相联、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现在位于广州光塔街的怀圣寺，就是唐代的伊斯

兰建筑。除了伊斯兰教之外，佛教文化的交流也通过海上往来活跃起来。唐代著名僧人义净就是乘船从广州出发到达印度的。他的著作《大唐求法高僧传》记载，西行求法的高僧有 60 多人，多数是从广州、合浦等地乘船出发。印度僧人也有不少人乘船来到广州。

宋朝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说：“北人（中国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我国人民在海外居留者逐渐增多，成为最早的华侨。因为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华侨自然是广东人最多。由于外贸发达，唐代留在广州的外侨也很多。这些外侨被称为“蕃客”，外侨的居住区称作“蕃坊”，外侨设立的学校称作“蕃学”。他们长期侨居中国，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宋代的海外贸易，在唐代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广州仍然是全国最大的海港城市 and 外贸中心。乳香是当时外贸进口最大宗的货物。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 年），广州、杭州、明州三市舶司共进口乳香为 354449 斤，而广州则有 348673 斤，占 98%。此外，广州、扬州、杭州、明州和泉州是当时造船的基地，而广州造的海船尤其著称。根据《岭外代答》记载，当时广州造的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柁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养酿酒其中”。风帆也大有改进，可根据不同的风力，使用不同的帆，而且有的是多桅多帆。加上指南针的应用，大大增强了海船的续航能力，贸易范围扩大，贸易对象国增加到 50 多个，超过了唐代。

唐宋两朝是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上的黄金时期，广州是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明珠。

三、明清两代广州长时期独口通商

明清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采取海禁政策。

明朝政权建立后，诏令不准私人从事海外贸易，甚至规定不准人民使用海外商货，违者予严厉惩处。为了管理朝廷垄断的这种贸易，明王朝于洪武三年（1370年），设立泉州、宁波、广州市舶司，并有明确分工。泉州为琉球登陆口岸；宁波为日本登陆口岸；广州为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许多国家的登陆口岸。显然，广州接待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贡使和商人，占了海外贸易的绝大部分。

随着明朝政权的巩固和经济上需求的增长，统治者曾一度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永乐三年（1405年）在广州西关设立了怀远驿，以接待各国贡使和商人。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由于西方殖民者和倭寇在通商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明王朝废除了宁波、泉州两市舶司，只留广州一口岸对外通商。从此，广州港在较长的时间内独揽了我国的海外贸易。

除了朝廷垄断的海外贸易之外，私人海外贸易被禁止，但实际上是禁而不止。到了明朝后期，私人的海外贸易已很盛行。广州港来往的船舶很多，其中许多是私商的贸易船。出现了“番舶衔尾而接”的景况。当时最繁荣的濠畔街，已是“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十七）

清朝初期也实行禁海闭关政策，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巩固，1684年，康熙皇帝废除海禁，并于1685年宣布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为对外贸易口岸，分别在四处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为了防止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清朝政府又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撤销了漳州、宁波和云台山三处通商口岸，只留广州一口岸对外贸易。广州再次独揽了海外贸易，粤海关也成了我国唯一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从此，出现了清代广州海外贸易的繁荣时期。1757年，来广州的外国商船只有7艘，到1836年已达199艘。与此同时，从广州起航的我国商船也不断增加。这一时期，广州外贸一直处于出超地位。

四、长盛不衰，长期领先

从秦汉开始，2000余年，广州的海外贸易都在发展，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秦汉以来，随着海外贸易和交通的发展，我国沿海地区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港口城市，但都不如广州的历史悠久，更不如广州长盛不衰。无论在古代、近代和现代，广州在我国的海外贸易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古今长盛、内外闻名的通商口岸，时至今日，广州仍然是我国重要的沿海开放城市，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广州的对外贸易为什么能长盛不衰，在我国沿海港口城市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地理位置优越。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北缘，是东、西、北三江汇集至珠江的出海处，既是河港，又是海港，海上交通和内河交通都很方便。港口深居珠江三角洲的内侧，商船的寄碇更加安全。此外，我国古代海外贸易的对象国主要是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当时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较低，海船的续航能力有限，来我国贸易的船舶自然是先到航程较近的广州。

第二，广州有深广的腹地。珠江三角洲水道纵横，不仅内河交通十分方便，而且物产丰富。广州及附近地区的丝织品、瓷器、铁器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享誉海内外，成为海外贸易的丰富货源。在历史上，我国外贸的出口产品，在很长时期内以丝绸为主。珠江三角洲就是我国三大蚕丝产地之一。明清时期的粤缎、广纱在国内外都很受欢迎。唐宋开始，陶瓷大量出口。佛山石湾的瓷器更是闻名遐迩。不仅如此，东、西、北三江既联络了广东各地，又沟通了湖南和江西的广阔地区。海路又与我国沿海一带往来。从广州溯江而上，可通云、贵、川三省。西江还可通漓江和灵渠，进入湘江，沟通长江水系。这么深广的腹地，不仅

使广州港货源充足，对进口的商货也有很强的消化能力。加上广州地区造船业发达，为联络广阔腹地和发展海外交通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政治上的原因。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海外贸易获利丰厚，外贸经营的好坏，严重影响国库的收入。为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满足统治者享受的需要，明朝以前历代的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海外贸易，并采取积极支持和鼓励的政策，这都有利于广州外贸的发展。同时与沿海其他港口城市相比较，广州距京城较远，即使在安全上出了点什么问题，也不会马上威胁到最高集团。所以，明清两朝推行的闭关政策，更是形成了广州一口垄断海外贸易的局面。

五、近代以来广州外贸性质和地位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我国的对外贸易性质也从独立自主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广州的外贸自然也是如此。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扩大，广州外贸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日益加深，表现为资本主义列强在广州经济贸易活动中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关税，以及进出口贸易中的不平等性和掠夺性。在不同时期，资本主义列强掠夺的方式和手段有所不同。1840—1860年时期，资本主义列强主要是采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海盗式的手段，通过可耻的鸦片贸易和贩卖华工出口，谋取高额利润。1860—1894年时期，帝国主义国家逐渐垄断了广州进出口市场，把广州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通过不等价交换对广州进行经济侵略。这一时期，外国资本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尤其是1863年英国人赫德任总税务司之后，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完全落入了外国人手中，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工具。1894—1895年时期，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的同时，进行资本输出。帝国主义

利用以海关关税为担保的借款，进一步取得海关经济收入的支配权。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推行有利于日本侵华战争需要的贸易政策，控制广州港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权，从而完全控制了广州的对外贸易。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广大的国土又陷入了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美国利用在中国取得的各种特权，倾销过剩的商品，广州对外贸易的呈现一片萧条景象。

在近代广州外贸性质变化的同时，随着全国外贸重心的北移，广州外贸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逐渐下降。19世纪50年代，广州在我国外贸的中心地位已为上海代替。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口岸越来越多，侵略的重心逐渐转到了我国东部和中部。到1911年以后，天津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也超过了广州。此后，武汉和大连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不时超过广州，广州外贸退居全国第四或第五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广州外贸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政府按照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外贸原则，制定了一系列的外贸政策，广州的外贸得到了迅速发展。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成绩尤其显著。1990年广州外贸出口总额已达13.88亿美元，为改革开放前1978年1.34亿美元的10.3倍，而且出口商品结构趋向合理化，销售市场逐步扩大，由近邻扩展到远洋，出口商品基地也初具规模，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外贸格局已开始形成。1987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指出广州市的经济发展要“以外经贸为导向”。展望未来，广州对外贸易的前景非常美好。

未来是过去和今天的延伸。为了未来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地认识过去。因此，我们撰写了这套《广州外贸史》。它记录着我们对二千多年来广州外贸发展历程的探索和理解，寄托着我们对明天的展望与期待。望阅读本书的朋友们对我们提出坦率的意见。

第一章

广州外贸渊源及早期的发展

第一节 广州外贸渊源

广州外贸有悠久的历史，秦汉时期是广州外贸的形成期。

广州古称番禺，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时，列举了全国有 19 个商业性的大都会，番禺是其中的一个，称此地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凑”者，会合之义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的意思。《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对它的市场作用，说得更为明确：“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处近海”，即滨海之地，也就是一个海港都会。这个海港都会主要以经营犀、象、毒冒、珠玑等特殊商品为大宗。由于这些商品很受中原人士的欢迎，所以中原商贾往番禺经商者，多数都发财致富。

中原商贾何时与番禺发生商业关系？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比《史记》成书早 30 年的《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说：“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越”，即南越，古人称岭南地带为南越。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秦始皇发卒 50 万进军南越，也是带有取得南越的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的意图在内的。当然，像秦始皇这样开疆拓土的君主，绝不会单纯为了犀角、象齿等商品而发动这样一次大

规模的军事行动，他远征南越还有其政治目的。但话又说回来，秦始皇既然把攫取犀角、象牙等珍品当作征南越的因素之一，则中原与番禺通商当有相当之时日，最低限度在战国时代已有商业的关系，否则，其经济特产不可能如此深入人心。

番禺既然在战国时已经成了王公贵族们所追求的奢侈品市场，这些奢侈品又是从何而来呢？除合浦（今广西合浦）周朝时已有珍珠的开采外，海南岛亦有珠、犀、玳瑁的出产。《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曰：“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珠崖（海南岛）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贾）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使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诘问之，……（贾）捐之对曰：‘……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细观此则史料，可以知道在汉元帝放弃珠崖、儋耳两郡之前，曾考虑到珠玢、犀、玳瑁对番禺市场的供应问题，但贾捐之明确地答复，汇集在番禺市场的珠玢、犀、玳瑁等物，有多方面的渠道，所以弃海南岛而不足惜。这些渠道包括当时仍属中国版图的越南中部和北部，还包括已有远洋商船往来的番禺。我国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指出：“《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为珠玢、犀、玳瑁、果布之凑，此语非指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至交、广者矣。”^①而日本汉学家藤田丰八则说得更为具体：交广之珍异似为其本地所出，然此不过对中土而言的结果，多数珍品实由海上贸易获得的^②。就是说，汇集在番禺市场的珠玢、犀象、玳瑁等物，有相当数量是从海外进口的。

中国何时在海外交通和贸易？《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最早记载了这一情况，文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

① 吕思勉：《吕思勉读书札记》乙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 藤田古储备：《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有稟食而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三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则史料的时代背景，当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前87年），具体一点说是在汉武帝征南越后，因那时才有日南郡的设立，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中央政府的势力方能扩张至广东和交趾一带。史料明确显示，由汉廷派出担任海外贸易的译使和应募者，携带黄金、杂缯（丝织品），由日南（今越南中部）、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三个地方出航，途经都元国、邑卢没国、夫甘都卢国、谶离国、黄支国，抵达已程不国后返航。回航途中经皮宗，在日南象林县边境登陆。带回来的物品有明珠、璧流离、奇石等异物。关于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在中外史学界中，目前仍无绝对准确的考证，惟黄支国在今印度半岛东南部的康契普腊姆，皮宗在今马来半岛西南沿海的香蕉岛，已程不国为今斯里兰卡，则是比较一致的意见。这条航线的走向大致是：从徐闻、合浦、日南等地启航后，沿着印度支那半岛海岸线航行，渡过暹罗湾后，再南下至马来半岛东岸登陆，步行越过克拉地峡后，到西岸今缅甸的一个港口登陆，然后绕孟加拉湾海岸线航行，抵印度半岛东南隅，南下斯里兰卡后返航，这也是初期南海道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

然而，决不能认为广东的海外交通和贸易始于这个时期，广东（包括广州）的海外交通和贸易，要比《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早得多。因《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仅是官方贸易中某一次的行程。在这之前，肯定已有民间贸易的交往，因为只有民间贸